

庄子文化与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陈德琥 刘运好 魏小红**

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庄子文化所蕴含的生态观念、生态智慧为依托，以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树立生态共同体发展理念”“项目设计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多地多方联动运作机制”“建设生态+文化廊道”等具体举措入手，建构创新共建、协调共进、绿色共保、开放共赢、民生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大力助推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庄子文化 生态智慧 淮河经济带 生态文明

庄子文化是淮畔民众基于《庄子》的哲学思想、生态观念及诗性精神等“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①。其生态意蕴、生态伦理、生态智慧不仅是淮河文化内涵之一，而且对当今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价值，成为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本课题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庄子文化所蕴含的生态观念、生态智慧为依托，以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生态文明：淮河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任务”“生态思想：庄子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智慧：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策略”等角度，讨论庄子文化与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一、生态文明：淮河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任务

从研究内容上讲，“庄子文化与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课题关涉一

* 此文为安徽省庄子研究会2022年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 陈德琥，亳州学院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亳州学院特聘教授。魏小红，亳州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副教授。

①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载《饮冰室合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98页。

个主体、两个维度和四个关键词。“一个主体”即淮河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维度”包括围绕“主体”需要的“庄子文化”价值维度与“发展策略”实践维度，四个关键词分别是“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庄子文化”“发展策略”。因此，本课题研究的重心是“庄子文化”对于淮河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发现与实践路径。这又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论证：既要理清“淮河经济带”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联系，把握“一个主体”的发展目标与现实需要；又要抓住这一“主体”与“庄子文化”的关联，揭示“庄子文化”（特别是其生态意蕴、生态智慧、生态理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与意义；更需基于“庄子文化”之于“一个主体”的价值发现而提出具体的“发展策略”。为了逐步展开研究，首先应讨论“淮河经济带”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即“生态文明：淮河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任务”。

实际上，淮河经济带把“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作为建设目标，首先考虑的是淮河流域不同于其他流域和地区的“自然禀赋”。千里长淮（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贯通南北、连接东西”。淮河经济带以淮河干流、一级支流以及下游沂沭泗水系流经的地区为规划范围，整体面积为24.3万平方公里。这一区域位于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生物多样性丰富，平原面积广阔，湖泊众多，水系发达，生态系统较为稳定。显而易见，“五六月间无暑气，二三更后有渔歌”（淮河中游正阳关迎水寺的楹联）的淮河流域，具有不同于长江、黄河流域的自然资源，这是淮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

《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美丽淮河”。为此，它紧扣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打造绿色生态廊道，完善基础设施网络”等具体要求：“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淮河目标基本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宽裕，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产业分工协作格局不断巩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建成美丽宜居、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生态经济带，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第二章《总体要求》的第五节《发展目标》）显然，生态廊道打造是淮河经济带建设的基本定位，生

态文明建设成为淮河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目标。

（一）“淮河经济带”课题研究的“绿色生态长廊”构想

2015年，顾为东主编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将“绿色生态长廊”的打造作为淮河经济带建设的基本定位——以江苏淮安、安徽蚌埠、河南信阳等沿淮“中心城市”为依托，把苏北、皖北、豫南境内的淮河流域建设成智慧型的“生态经济长廊”，并对接长三角一体化、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以及江苏沿海开发、东陇海线发展战略等，从综合效益和更高层次上进行发展战略的全面提升。^①也就是说，淮河经济带以“生态经济”“绿色发展”为建设重点，以打造“绿色生态长廊”作为基本定位，由此凸显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

实际上，早在“淮河经济带”课题研究之初，“生态”就是焦点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已见端倪。2010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软科学重大问题研究项目“中国东中部地区协调发展——以淮安、蚌埠为双核，建设淮河生态经济走廊”正式启动，此后，围绕“双核”城市（淮安、蚌埠），展开了深入调研，举办了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伴随课题研究的推进，逐渐凝练出“东中部地区”“‘双核’城市”“生态经济走廊”“协调发展”等关键词，从理论上厘清了淮河经济带应着力于“生态走廊”建设和“蓝色发展”“联动发展”“协调发展”等问题。其中，有几次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值得一提。比如，201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建构淮河生态经济走廊研究”中期成果座谈会，围绕“生态经济走廊”发展轴的确定、中下游黄金水道的开发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明确了项目的后期工作重点。2013年8月，该课题正式更名为“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农业部、交通部，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发改委，沿淮各城市特别是蚌埠市、淮安市的主要负责人及专家们，对课题成果《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报告（2013—2030）》作了进一步研讨，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到12月课题结项。可以说，“淮河经济带”从课题研究到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生态廊道”“绿色发展”等关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都是研究的核心、关注的焦点和规划的重点。

^① 顾为东主编：《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二) 淮河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定位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出台。该纲要在第九篇三十七章第三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明确提出:“支持中部地区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培育壮大沿江沿线城市群和都市圈增长极。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支持能源产业转型发展,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培育一批产业集群。加强水环境保护和治理,推进鄱阳湖、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和汉江、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以“十三五”发展规划为标志,淮河经济带被命名为“淮河生态经济带”,成为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其二,“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主要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承接产业转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三,“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以“加强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绿色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为基本目标。

显然,在中部地区崛起过程中,淮河经济带建设不仅要对外加强联动发展,尽快构建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作用,而且对内的全域发展又必须致力于现代农业、新兴产业和科技赋能的产业集群打造和“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绿色经济”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便立足于淮河流域湖泊众多、水系发达、生物多样性丰富、平原面积广阔、生态系统较为稳定以及作为我国商品粮重要基地等优良的“自然禀赋”,设专章(第三章《打造绿色生态廊道》),分五节(《建设沿淮生态屏障》《节约保护水资源》《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共建跨区域环境保护机制》),提出了“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目标。

如《建设沿淮生态屏障》一节,规划出三个沿淮“生态走廊”。其一是提升南水北调东线生态净化能力和涵养功能,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和沂沭泗河生态走廊;其二是加大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沿海滩涂湿地、苏北沿海重要渔业水域保护,打造沿海滩涂湿地生态走廊;其三是加强南水北调中线源头区水土流失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生态保育功能。仅此“生态走廊”一端,在《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中可谓片言居要,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深度融入发展规划的明

证。也就是说，从课题研究的“初心”，到发展规划的方案设计，生态文明建设都是淮河经济带建设重要的目标任务。

二、生态思想：庄子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际上，淮河经济带把生态文明作为规划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与其“自然禀赋”息息相关，也与淮河流域的“人文禀赋”密不可分。淮河文化博大而精深，其生态蕴含丰富而深厚，而淮河人也充满了生态智慧。可以肯定地说，“道法自然”^①，“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②，“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③等充实了中国生态思想文化，丰富了淮河文化记忆，对淮河流域的“人文禀赋”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不能不提庄子的生态思想。从文体上看，与格言体的《道德经》、语录体的《论语》不同，《庄子》是寓言体（“哲学里的文学、文学中的哲学”）；从思想内涵上看，与孔子以现实存在为依据而建构道德秩序不同，也与老子以宇宙本原为法则而探求适应自然法则的生存策略有别，庄子以相对主义为哲学认知，强调摆脱现实桎梏的生命自由。因此，庄子哲学更接近老子思想。他以自然为万物本体，以齐一万物为基本认知，以“顺物自然”^④为行为准则，以“处乎材与不材之间”^⑤为生存策略，以生命自由为生活目标，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中独树一帜，以至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⑥。

就生态思想而言，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⑦的主张，将人与天看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与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⑧的整体生态观一脉相承，大体上包括以下内容：“人与天一”的生态观念、“与天和者也”的生态伦理和“至德之世”的生态理想。

①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64页。

②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865页。

③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610页。

④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235页。

⑤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534页。

⑥ 闻一多：《古典新义》，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8页。

⑦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80页。

⑧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64页。

(一) “人与天一”的生态观念

庄子在其《山木》篇中，曾借颜回请教孔子的情节（谨守正道而随应变化之理）提出了“人与天一”的生态观念：“（回曰：）‘何谓人与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①意思是说，颜回问道：“什么叫作人与自然原本也是同一的呢？”孔子答道：“人类的出现，是由于自然；自然的出现，也是由于自然。（普通）人不具有自然的本性，是（普通）人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圣人却安然体解，随着自然变化而告终！”^②在庄子“人与天一”的整体生态观念中，人来自自然，应敬重自然，所谓“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③，人也是自然之子。正因此，人也当融入自然，最终回归自然，以至于生游死归，“晏然体逝而终”。

在庄子看来，万物不仅是整体的，又是彼此依赖、交互影响的。如“民食刍豢，麋鹿食荂，螂蛆甘带，鸱鸦嗜鼠”^④，人吃禽兽的肉，麋鹿吃草，蜈蚣爱吃蛇，猫头鹰和乌鸦则爱吃老鼠。通过对自然界的周密观察，庄子从“民”“麋鹿”“螂蛆”“鸱鸦”的“美味”（“刍豢”“荂”“带”“鼠”）各异切入，着重于是与非、美与丑、利与害的相对性的讨论，但似乎同时发现了万物的交互影响，包括食物链的存在。如“刍豢”，用草喂的叫“刍”，指牛羊；用谷子喂的叫“豢”，指家畜（参看司马彪“牛羊曰刍，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之说）。而牛羊犬豕又是人之“所食”，即“民食刍豢”。显然，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在庄子的整体生态观中，“民”“麋鹿”“螂蛆”“鸱鸦”以及空气、尘埃等也是彼此联系、相互转化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⑤“野马”，谓空中之游气；“尘埃”，谓空中之游尘；“生物”，谓空中活动之物。此句意即空中野马般的游气、飘动的游尘以及活动之物，皆因风吹而动（表面上毫不相干，事实上却息息相通）。这就构筑了彼此联系、互为影响的大千世界。正因此，庄子又认为万物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

①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556页。

② 对比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译文：“人为，是出于自然的；自然的事，也出于自然的……”（中华书局，1983年，第560页），其中，“有人”译作“人为”似不妥。

③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500页。

④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90页。

⑤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

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① 这里直接道明所有万物都是一体的，只是（人们有区别地）把所称为美的看作神奇，把所厌恶的视为臭腐；（而实际上）臭腐又化为神奇，神奇又化为臭腐（圣人却珍视那种无分别的“同一”）。从这个角度讲，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

（二）“与天和者也”的生态伦理

显然，正是基于“人与天一”的生态观，庄子将宇宙看作彼此联系的、相互依赖的、交互影响的、可以转化的整体。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出发，“‘我’和万物为一体，同根同祖，每个生命体包括林、湖、草等（非生命体）都是天地之子，本是同根生，应该平等对待，否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②。也就是说，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类的取法对象，人人都是自然之子，须以平等、尊重、顺应的方式来看待自然。为此，庄子提出了“与天和者也”的生态伦理命题：“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③ 意即明了天地之德，便是大根本、大宗原了，也就到了与天和合的境界。用（天地之德）来均调天下，可以与人和合。与人和合的，称为人乐；与天和合的，称为天乐。那么，“天地之德”者何？“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④ 它指的就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所以，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顺应自然而动；其死也物化，与外物融合；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动静之间，负阴抱阳。从生态伦理看，“与天和者也”至少包括“利物”“顺物”两方面内容。

“利物”就是以仁心对待自然。孔子之“仁”与老庄之“道”分别是儒道哲学的核心概念，二者却存在内在关联。就庄子而言，他主张“仁”，但他的“仁”不同于儒家“仁者爱人”社会道德之“仁”，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基础

①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597页。

② 胡文臻、潘晨光、郭颺：《大众庄学·内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6页。

③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367页。

④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364页。

上的“仁”，而是泽被人类又善待自然的“仁”，即“爱人利物之谓仁”^①。他关爱有生命的人、人类（如“重生”“自快”“乐生”等，不是本文讨论重点，故不赘述），称之为“仁”；同时善待无生命的自然界，也叫作“仁”。“利物”，就是把无生命的自然界看作有生命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善待它就是“爱人”（善待人类），掠夺它就是毁灭人类自己。显然，“与天和者也”是基本的生态伦理。

与“利物”善待自然的仁心不同，“顺物”已触及行为层面。“顺物自然”本来是庄子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主张，却反映出他富有创见的生态伦理意蕴：“无名入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②面对“天根”（庄子虚拟的人物——笔者注）反复追问（怎样治理国家），“无名入”作如下回答：只要你游心于恬淡之境，合气于清静之乡，顺着事物自然的本性而不掺杂任何个人私心成见，天下就海宇清平，治理国家也就成功了（参看成玄英《疏》：“游汝心神于恬淡之域，合汝形气于寂寞之乡”）。显然，“顺物自然”须摒除私心杂念而“游心于淡”“合气于漠”，进而明“天地之德”，得“天乐”旨趣，只有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与天和者也”的境界。对待自然环境也是如此。胡文臻解读《应帝王》的当代意义时作如下发挥：“治国理政，必须要解决人与人的思想问题，即‘汝游心于淡’；必须解决人与社会安宁的环境问题，即具有修养的人与社会生活、和谐环境融为一体，而人不追逐利诱，即‘合气于漠’；解决人与自然规律的意识问题，即遵守人与自然规律生存的方法，即‘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最终达到‘而天下治矣’的国泰民安目标。”^③此言中的。庄子在两千年前勾画的治国理政理想方式，蕴含着“社会和谐”，同时包括对“环境和谐”的思考，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顺应自然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掠夺自然，遵循自然生存法则而不是随意地违背自然规律，才能保有绿水青山、天清地宁。“顺物自然”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模式。

①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323页。

②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235页。

③ 胡文臻、潘晨光、郭颺：《大众庄学·内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45页。

（三）“至德之世”的生态理想

必须指出，“人与天一”“与天和者也”还关涉中国文化核心概念之一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①是基本的行为准则，“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②是基本的审美准则，而庄子的“与天和者也”“与人和者也”则是从自然到人伦的整体准则。种种准则的融会，形成了中国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庄子从整体生态观出发，描绘了人与自然“群生”“共处”“大美”等生态和谐共生情状，建构其“至德之隆”的生态理想世界。

“群生”是庄子心目中万物共生的状态。他在《马蹄》篇里提道：“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③意思是说，万物共处，居所相连；禽兽成群结队，草木茁壮生长。禽兽可以让人牵引着去游玩，连鸟鹊的巢穴也可以让人随意攀登窥探。“至德之世”就是万物共生、聚合共存的世界。

“共处”是庄子心目中万物和谐的状态。在《马蹄》篇中，除了描述万物共生的“群生”状态外，亦呈现万物和谐的情状：“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④在“至德之世”中，不仅人与禽兽杂居，与万物共存，连君子、小人（已受到“至德”感化）也无区别，这是环境和谐、社会和谐的理想境界。庄子也曾借神农氏来说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⑤意思是说，人们与麋鹿生活在一起，耕田而食，织布而衣，没有相互加害之意，只有和谐共生之心，这是“至德之隆”即道德极盛的时代。

“大美”是庄子心目中诗意栖居的理想生活境界。在他创造的和谐共生的世界里，有基本的精神指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⑥天地之美，四时之法，万物之理，虽然不高谈，不阔论，不游说，

①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8年，第59页。

②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8年，第441页。

③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270页。

④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270页。

⑤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827页。

⑥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601页。

却自然而然地进入“与物为春”^①的境界。“大美”“明法”“成理”而充满善意、春意的境界的存在，得益于“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即圣人能推究天地的大美而通达万物的道理。因此，“至德之世”，天无私覆、地无私载，顺任自然又充盈暖意，是“大美”的世界，又是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

三、生态智慧：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策略

中国文化是现实文化，不仅带有“人间的性格”“现世的性格”，而且具有“历史”“现代”“将来”的价值与意义。^② 庄子的生态思想也不仅仅停留在“垂训之功”的层面，而是不间断地向现实转化。比如，“治（淮）水兴邦”的历程中就不乏庄子的生态智慧。也就是说，庄子成了淮河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庄子文化是与时俱进的现实文化。庄子的生态思想、生态智慧已沉淀为淮河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策略。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精神，在原有的发展基础上，淮河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树立生态共同体发展理念”“项目设计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多地多方联动发展机制”“建设‘生态+文化’廊道”等为主要发展举措。

（一）树立生态共同体发展理念

生态共同体发展理念，是基于发展区域相连、自然禀赋相近、文化特质相同而整体推进、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这既与庄子的整体生态观有内在关联，也与淮河流域上中下游的“自然禀赋”“人文禀赋”相似密不可分，更与淮河经济带绿色廊道打造息息相关。淮河流域“地平壤厚，得中土之和气，百物以蕃，众庶以集”（光绪《亳州志》卷一）几成共识。从发展区域讲，淮河流域尽管有上中下游之分，却是互为关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上游生态出了问题，中游、下游的绿色发展必然受到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而下游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到位，即便上游、中游的环境治理非常出色，也不能认定淮河流域的绿色廊道就打造好了。也就是说，淮河流域的绿色发展应当基于庄子的整体生态观，以生态共同体

①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172页。

②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商务印书馆，2010年，“自叙”第1—2页。

为基本发展理念。从人文角度看，淮河文化同根同源又特征鲜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早就说过：“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的北部连在一起，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因此，“不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淮河流域来，很可能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①显然，淮河流域“土风备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苏轼《颍州谢表》），淮河文化具有区别于黄河、长江文化的主体文化特征。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伴随治（淮）水兴邦，“以海为壑”而不“以邻为壑”、共建共享而不“画地为牢”已成传统。因此，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又必须以文化共同体为发展理念。

而从“自然禀赋”上说，千里长淮更有其自然地貌、气候、生物的共生和共性特征，诸如流域内湖泊众多、水系发达、平原为主地貌、气候温和、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处南北分界线上的如此“自然禀赋”，使淮河流域成为打造绿色廊道的极佳区域。因此，在生态共同体发展理念下，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合理分工，提高政策协同，深化区域合作，进而建构创新共建、协调共进、绿色共保、开放共赢、民生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体系^②是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重点。显然，淮河流域既有相同的文化基因，更有合作共赢的实践基础。基于此，发挥平原文化互相融合的优势，激活文化成长密码，强化国家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是打造淮河经济带绿色廊道的根本性发展策略。

庄子提倡彼此联系、交互影响的整体生态观显然对生态共同体发展理念有很大影响。实际上，就目前研究成果看，省际、城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已是大势所趋，相关研究较为深入，实施策略也逐渐成熟^③。而从现实文化层面看，类似“五六月间无暑气，二三更后有渔歌”那渔歌互答、景致宜人的风景图，绝不是一条支流、一个区域（如中游地区）的人民能勾画出来的，而是互促联动、共建共享的产物。对于淮河经济带绿色廊道打造来说，重点建设内容包含以下几方

① 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文物》1978年第3期。

② 陈德琥、孙斌、方孝坤：《一体化发展引领淮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带状布局》，《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21年第2辑。

③ 陈震、张智勇、张联君等：《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首届贵州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高峰论坛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面：建构交通设施“共同体”，打造“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海陆空交通网络；推进公共服务“共同体”，推动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实施绿色发展“共同体”，重构淮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等等。要言之，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为建设目标，以一体化发展为引领，以生态共同体为发展理念，以共建淮河文化圈为基础，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发展、联动发展、共同发展格局，是庄子生态大智慧的集中体现，对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二）项目设计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说生态共同体发展理念是基于庄子整体生态观的意识与观念层面的生态智慧，那么，项目设计则是这一智慧的现实展开，是与时俱进的落地性发展策略。因此，抓好项目设计，是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又一重要策略。由上文可知，庄子的生态思想不会停留于“垂训之功”，而是不间断地向现实转化。如“顺物自然”就不仅要求“游心于淡”“合气于漠”，而且落实起来还必须弃成见、不偏向、无私念。问题在于，历史地看，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五省过去的建设重点都不在淮河流域，基本上没给淮河流域更多发展机会，当然也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这做到“无容私焉”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真实情况是，淮河流域五省的重大建设项目都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淮河经济带（江苏省的发展重心在苏南，山东省在青岛及沿海地区，河南省在郑州中原城市群，安徽省则在合肥与皖江城市群）。也就是说，在淮河经济带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前，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在其相关省份都不是关注的焦点与发展的重点。存有成见、偏向可谓久矣！应当看到，在中国古代内向型经济模式下，淮河流域处于“贯通南北”地带，文化繁荣、经济发达，为中国“农耕—生存性”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早在战国时期，淮河流域已是“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①，“深耕均种疾耰”^②的农业经济状况，而其后很长时间内长江流域还是“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③的落后面貌。对比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的农业

①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728页。

②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401页。

③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经济也很发达：“且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①淮河流域曾是中国农业经济的高地，直到唐朝，依然是“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从文化发展看，在轴心时代，淮河流域即“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已经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全盛时代”^②的标志。

正是在文化交融与南渐的过程中，创生出“郑汴洛”等重要城市，这自不待言。即以济水之上不算大的城市济宁为例，自开通漕运（《元史·河渠志》载：“济州河者，新开以通漕运也”）始，元明清三朝均于此设立最高司运机构河道总督衙门，济宁便凭借京杭大运河黄金水道，成为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连马可波罗也在其游记中写道：济宁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商品与手工艺制品特别丰富，而运河中航行的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由此可见济宁在中国古代内向型经济背景下的繁华盛景。而济宁古运河水道也成为一条文化内涵丰富、旅游资源密集的文化遗产廊道。只是在外向型经济模式下，淮河流域社会经济逐渐走向低迷，类似济宁这样“风光不再”的城市不一而足。

因此，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也是为了落实庄子的生态智慧，在“十四五”期间，沿淮各省都应当给予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足够的支持。从目前有关省份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方案”看，项目引领已提上议事日程。如，安徽省为了推进亳州“省际毗邻中心城市”建设，推出“亳州老子文化产业园”项目，主要是以亳州（1986年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8年成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20年荣获“中国康养旅游目的地”称号）为依托，升级为沿涡河（以亳州为中心，整合上游河南开封、通许到鹿邑等地资源，连接入淮口的蚌埠涂山）的康养文化廊道，这显然是省际共建、绿色发展的大项目。《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合作（蚌埠）宣言》则进一步指明：“推动淮河流域省际、市域间文化旅游协同合作，携手打造淮河流域全域旅游精品线路；加强文化合作共建，共同挖掘和发展以大禹精神为发端、以淮河历史文化为延续、以各类文艺表现形式为内容的文化体系，构筑起继承民族文化精髓、坚定文化自信的淮河文化走廊。”显

①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64—1765页。

② 梁启超：《全盛时代》，载《饮冰室合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

然，“大禹精神”是淮河文化的重要记忆，“蚌埠大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蚌埠禹墟，是禹会诸侯之地）对于打造联动河南（禹州）、浙江（自1995年以来，祭禹已成为绍兴市的一个常设节会）等跨地区合作的“禹文化”廊道也具有重要意义。科学谋划、项目引领、带状布局、共建共享，是淮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策略。

（三）建立多地多方联动发展机制

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从汗水型经济到智慧型经济，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的关联性越来越强。正所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构，不仅关涉国内的供需、生产、分配、空间和技术格局，亦同整个外部环境紧密相关”^①。上文述及在庄子的生态观中，一直将万物视为彼此依赖、交互影响、相互转化的整体。这对我们推进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多有启发。事实上，淮河流域的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机会之多、强度之大，绝非其他任何地区可与匹敌，淮河文化具有兼容性特质，这决定了其作为文化资源的可联动性禀赋。也就是说，淮河生态经济带的联动发展包括生态文明建设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基础。从古代大禹的“平水土”（《尚书·舜典》）到现代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都是明证。可以说，“治（淮）水兴邦”从来都是联动共建、合作共赢的结果。

应当看到，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项目提出的“初心”之一，就是区域中心城市（《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中以“信阳—蚌埠—淮安”三市为中心，《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确定“信阳—蚌埠—阜阳—淮安—盐城—徐州”六市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笔者注）之间的协调发展、合作共赢。其中，“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深化合作，扩大开放”等是《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因此，建构省际—城际互动平台，完善省际—城际联动机制是最主要的发展路向、最具可行性的发展举措，也是落实习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实现《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目标的重要策略。

在淮河生态经济带推行的诸多举措中，“淮河流域绿色发展论坛”值得一提。2017年9月，淮河流域5省30多个地市的政府领导，以及环保部、中科院的专家学者齐聚蚌埠举办“淮河流域绿色发展论坛”，会上有学者提出绿色发展须配

^① 胡洪彬：《“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论域、短板与前瞻》，《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合联动发展和带状发展，产生较大社会反响，《蚌埠日报》等媒体作了专题报道。2018年6月，河南省率先建立内部联动为主、外部协作为辅的保护淮河模式，走在完善城市群之间协调发展的前列。2019年4月，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在淮安召开，各成员城市领导共同签署《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合作协议》，发布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合作（淮安）宣言》，并设计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合作会徽。《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合作（淮安）宣言》以“创新实践、精诚合作，合力推动淮河生态经济带协作机制高效率运转”为主题，突出了“努力形成城市互动、区域联动、上下齐动的工作格局”。这为淮河经济带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而在2020年10月，淮河生态经济带第二次会议出台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合作（蚌埠）宣言》，号召携手建设“创新发展之河”“协调发展之河”“开放发展之河”，又迈出联动发展更坚实的一步。就目前相关举措看，“省际联席会议”制、“城市合作市长会商会”制、“企业家交流合作”制以及“飞地经济”模式（文旅联盟旅游客源共济合作协议）等联动机制已较为成熟。

（四）建设“生态+文化”廊道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①生态文明建设从来都离不开文化建设。从这个角度讲，“淮河生态经济带”所打造的“绿色生态廊道”，不仅是“生态廊道”，还是“文化廊道”。也就是说，淮河人正在实现庄子所描绘的人与自然“群生”“共处”“大美”的“至德之世”，努力建设生态和谐共生、文化和谐进步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个“生态+文化”淮河走廊。

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运河（京杭）文化带”（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47千米，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不待言，其他像寿县的安丰塘（芍陂）（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声名远播。这一始于春秋时期、沿用至今而“灌田万顷，号安丰塘”（《旧唐书·地理志》）的水利工程，选址科学，布局合理，水源充沛，其洪井晚霞、沙涧荷露、凤凰观日出、利泽门赏月、石马观古塘等宜人景致的观赏价值，孙公祠、邓艾庙塔、古城墙遗址等的文化价值，航运、发电、水产品、灌溉增产的经济价值等都值得重视，已成为淮河流域“生态+文化”廊道的典范，对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74页。

淮河经济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强的示范价值。“生态+文化”廊道打造是项目落地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抓手。

因此，围绕《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目标，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目标，淮河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内因外联、联动发展，分层级打造不同类别的“生态+文化”廊道。一是要以“四轴”为主线，以（申报）建设国家级“淮河文化试验区”为引领，挖掘各省文化资源，力争打造出具有一定世界影响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化”廊道。比如，上文提到的运河（京杭）文化带等。二是以省级文化旅游建设项目为依托，发挥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职能，推出有全国影响的“生态+文化”带状发展产品。比如，上文提到的“亳州老子文化产业园”“蚌埠大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等。同时，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联系上海奉贤区，采用“飞地经济”模式，完善上海绿色农产品（蔬菜—粮食—牲畜等）和绿色食品（亳州药膳和淮河流域的特色小吃等）供应链，联合打造庄子所说的“万物群生，连属其乡”且具有国家影响的乡村文化旅游廊道。三是发掘市级“生态+文化”廊道建设项目，主要开掘县域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省内特色与优势的产品。如安徽省亳州市围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康养旅游目的地，整合“药都文化”资源，推行跨城镇合作，打造出“万亩亳菊”“万亩亳芍”（养“目”、养“身”、养“心”等养生休闲功能并举）观赏与体验长廊等文化旅游产业品牌；蒙城县“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21个省级示范村，已形成从县城可四面出行的“乡村游”线路^①。紧扣“一体化发展”与“高质量发展”，以生态共同体为发展理念，以联动发展为运作机制，促使“生态+文化”廊道打造的一个个项目落地，是深入推进淮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策略。

^① 赵秀法：《厚植生态文明优势 建设美丽宜居蒙城》，《科学导报》2020年第25期。